

● 陳良學 著

湖廣移民



與

陝南開發



● 三秦出版社

责任编辑 / 靳 磊

封面设计 / 毋培华



三 秦 出 版 社
SANQINGCHUBAN
中国·西安

ISBN 7-80628-173-8



9 787806 281734 >

湖廣移民與陝南開發

陳良學 著

三 秦 出 版 社

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

陈良学 著

出版发行：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710003

印 刷：安康东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1.125

插 页：4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标准书号：ISBN 7-80628-173-8/K·67

定 价：36.00元

内 容 提 要

陕南地处我国南北过渡的中间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特殊的地域文化特色。

从远古时期一直到近代，这一地区始终在人口的不断迁徙运动中起伏跌宕。尤其是明、清两代，陕南成为以湖广、闽粤为主体的全国性大移民的焦点，一场跨世纪的移民运动猛烈冲击着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使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华夏文化的各个板块在这里交相辉映的多元化特色。

明末清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使陕南社会经济几乎陷于绝境；与此同时，农民起义这场大规模的剧烈的阶级斗争，又深刻地触动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土地占有情况和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变化。清王朝建立之初，即大力推行“移垦”政策，招徕各地流民进山垦荒就食。从顺治颁布《垦荒令》开始，到康熙采取强制措施推行“移垦”政策，经过雍正、乾隆、嘉庆几个朝代的努力，历经一百余年，终使这一场涉及全国十几个省的大规模移民得以实现，这一战略性的移民，在陕南开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以太平天国为主线的国内革命战

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一场遍及东南和中西部地区各省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军事较量，再一次引起社会的大动荡，进而引起清代第二次大移民。这次以苏、皖、鄂地区为主体的大移民，给陕南带来又一次巨大的冲击。

明、清两代的几次大移民，促使陕南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闭关自守的陕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人口、耕地的迅猛增长，引起了陕南社会经济的大变革，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反压迫斗争和清政府的让步政策，使“永佃制”得以确立，从而削弱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触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最基本方面，这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发展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是农田水利的兴起，促进了大面积稻田的开垦和以包谷为主的各类杂粮的广泛种植，这不仅使陕南加强了抵御灾荒的能力，而且使很多地区的粮食产量由自给自足而逐步发展到自给有余。这样，一部分粮食和粮食加工品成为商品而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市场上，它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粮食等农副产品的需求又刺激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劳动人口的增多，不仅使许多荒山旷野乃至人迹罕至的地方变成了阡陌纵横、人口稠密的富饶之乡，而且也使蚕桑、茶叶、苧麻、生漆、桐油、木耳、药材等土特产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为土特产品生产及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开辟了市场；而陕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经过客民们一个多世纪的开发，又为土特产品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乾隆中叶以后，陕南各地的商品经济日趋繁荣，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乃至一大批手工

业工场的出现，使陕南进入了一个商品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陕南、北方各省和中原广大地区移民的大量迁入定居，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也促成了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古老的陕南文化在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以及岭南文化等外来文化形态的冲击和交融中，得到不断升华和完美，从而形成了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的地方特色，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有了重大发展，这一历史文化沉淀，直到今天仍反映在陕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本书力图全面阐述明清两代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开发陕南的全过程，同时还就这一政策对陕南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进步作用，广大农民对开发陕南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陕南商品经济的勃起、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历史文化的沉淀等历史事实作以揭示和探讨。本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篇 20 章，约 50 万字。其基本结构是：

上篇《客民移垦开发陕南》共 8 章，第一章从陕南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水陆交通及历代人口的迁徙、繁衍与消亡等方面论述了陕南的战略历史地位，提出了明清移民的历史课题；第二章从明代移民的历史背景、重要源流、基本类型三个方面论述了明代流民对陕南的开垦；第三、四两章则在叙述和分析明末清初大浩劫的基础上，论述了清代康熙乾嘉和同光时期两次移民高潮形成的历史背景、过程；第五、六、七、八章则分地区介绍了陕南移民的源流，对有代表性的 99 个移民家族源流分别进行了探讨。其中：湘川黔地区 38 个；湖北地区 28 个；闽粤地区 12 个；江南地区 21 个，使人大体上了解和认识湖广移民的基本情况。

中篇《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共 7 章，从人口对经济的作用上剖析清代中叶商品经济勃起的原因及状况，同时也涉及到清

王朝采取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在各章中分别论述了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作物的商品化及土特产品的内外贸易，纺织、缫丝、制陶等手工业的异军突起，统一市场的形成及商业资本的活动，手工业工场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连接移民的乡土纽带——会馆和帮会等，展示了17世纪陕南经济社会的基本面貌。

下篇《南北文化的历史沉淀》共5章，分别论述了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南北交融的民俗风情，兼收并蓄的生活习惯，色彩斑斓的民间文艺，神秘奇特的宗教文化。本篇各章涉及到移民家族的郡望堂号、谱牒家乘、宗祠族规、岁时节令、礼仪风尚、语言体系、衣食住行、地方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祭祀活动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对扑朔迷离的陕南文化民俗的形成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下篇《南北文化的历史沉淀》共5章，分别论述了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南北交融的民俗风情，兼收并蓄的生活习惯，色彩斑斓的民间文艺，神秘奇特的宗教文化。本篇各章涉及到移民家族的郡望堂号、谱牒家乘、宗祠族规、岁时节令、礼仪风尚、语言体系、衣食住行、地方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祭祀活动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对扑朔迷离的陕南文化民俗的形成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下篇《南北文化的历史沉淀》共5章，分别论述了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南北交融的民俗风情，兼收并蓄的生活习惯，色彩斑斓的民间文艺，神秘奇特的宗教文化。本篇各章涉及到移民家族的郡望堂号、谱牒家乘、宗祠族规、岁时节令、礼仪风尚、语言体系、衣食住行、地方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祭祀活动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对扑朔迷离的陕南文化民俗的形成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序

孙达人

两个月前良学君携《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稿，不远千里自陕专程来杭州看我。在他说明了来意之后，我们即开始了促膝谈心，真正可以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曾任陕西先后工作凡三十一年，而我为出生的老家浙江迄今才工作了六年。人生几何，在祖国的大地上恐怕再也不可能有别一块土地能像陕西那样给我留下这么多的记忆、可能让我贡献这样多的生命了；至于清前期陕南历史过去又是我曾经倾注过心血的领域。这样，从未谋面过的两个陌生人自然就一见如故，在几次长谈之后，又一直保持着相当频繁的联系。这可能是一种缘分吧！良学君来访主要是想请我为他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写一篇序。我清楚自己的学术功底不足以动辄为他人序，故平时对诸如此类的请求大抵以婉言相拒。这一回却欣然同意了他的写序之求，并不是自以为在这个研究领域有发言权，也不是自己在近期有可能认真研读他的书稿、作出得当的评估报告，而是他的值得赞誉的课题和令人神往的钻研精神，在在都勾起我对一些往事的回顾，禁不住要说几句心中的感想，同时乘机也想就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二个有关问题提出

几点建议。

我记得自己是在1960年10月从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人生中最长的那段生活历程。抵达西安后，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开始，先被派往郊区“整社”，1961年3月，又被下放到合阳县北黑池村去进行无期限的“劳炼”。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并开始了解我国北方的农村，我也第一次知道了用树叶、野菜、棉花籽油渣之类东西充饥是什么滋味……。当1962年终于有机会重返学校之际，我更坚定了自己的志向。本来，大学时的爱好使我选择了以秦汉史和农民战争史作为专业方向。师大历史系由于已有人教先秦至唐宋诸段的历史而唯独缺乏明清史的教师，因此，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讲授明清史，不如说是讲授明清史的需要，使我选择了研究清前期的陕南作为自己继续研究农民战争史的突破口。

陕南位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包括今之汉中、安康和商洛三个地区，自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特别是宋元以来，历来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山区。到了清前期，这个山区的经济面貌突然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了相当迅速又巨大的变化。当时，不仅有广阔的荒地和老林得到了开垦，更引人注目的是，甚至还出现了在当时的中国堪称规模最为巨大的手工业工场，从而使这个原先较为落后的山区，一跃而成为我国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之一。过去，许多史学家对于陕南的清前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事实已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是，对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落后的山区，却很少有人作深入研究。试想，在当时的中国许许多多经济比陕南要发达得多的地方，甚至连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也没有这样巨大的手工工场，而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却在落后的陕南发生了，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又究竟是为什

么？探讨这些问题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以致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师大和陕西省图书馆里所有有关陕南的方志及其它文献资料。研究工作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不幸，文革不仅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也毁掉了我积累的有关陕南几乎所有的资料。劫后，当七十年代末再一次有机会重操旧业之时，发现劫余唯有一本有关的笔记本而已！为了存留这段研究经历的一鳞半爪，我曾以那个笔记本为据，写出了《川楚豫皖流民与陕南经济的盛衰》一文，发表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三辑上。假如，还有读者感兴趣，不妨拣来一读，在这里不打算、也不应该加以介绍。我之所以要提及这件往事，目的主要是想请读者作一个比较：我作为一个专业史学工作者用了大约三年左右的时间，结果只是万余字的论文一篇，而良学以一个业余史学工作者在不过十三年的时间里就拿出了一部五十万言的巨著，其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怎么能够使我不由衷的钦佩？怎么能不为一个业余史学工作者作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绩而感奋呢？良学自幼生长在陕南这块土地上，成年后又长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他在最基层做过经济、文化工作，又做过秘书和宣传工作，也做过县级领导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幼生长在陕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童年时代，民间流传着‘湖广填陕西’的故事如同神话般撞击着儿时的心灵。成年后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 30 余年，从城镇到乡村，从川道到山区，耳闻目睹和亲身接触了大量的移民风情习俗，深刻感受到‘路隔三五里，人同音不同’这一奇妙的文化现象。于是，一个个疑间接踵呈现在脑际：为什么陕南山区人们把落日叫做‘太阳落水’而不叫‘太阳落山’？为什么陕南山区的生活习俗比山外的关中开放？为什么在同一乡间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习惯？为什么陕南的城市乃至乡村会有那么多的会馆？为什么宗教信仰、戏剧音乐、衣食住行等各种文化现象在

陕南表现得错综复杂、异彩纷呈？一系列的为什么逐渐引导着我从地方志和一些有关资料中接触到许多有关湖广等外省移民的点滴记载，它触发了我进一步试图弄清这一奇特文化现象之内涵的念头。”为了理明清大移民形成的原因、源流、过程、结果及其对陕南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风情的影响，从1984年开始，他便着手系统收集资料，研究考证。清前期陕南经济发展所展现的繁荣是很短暂的，恰似昙花一现；后来虽仍有升降起伏，最终还是归于更严重的衰落。职此之故，即以历史文献一端而论，存世的极其缺乏，存留在经济文化已相当落后的当地的尤其稀少。一位僻处地方的业余史学工作者只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到省内外各图书馆去阅读我们专业史学家随时能够读到的大量文献，这一点已属不易；更加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良学还把分散在乡土辽阔的万山丛中、迄今还不为国内史学家所重视的族谱和各种碑刻都一一收集起来，这是一件没有从事过此项收集工作的人恐怕难以完全理解其中的甘苦的事。让我们不妨还是再来听听他的自述：

“如果说从浩瀚的史籍中搜寻有关移民的记载如同大海捞针的话，那么，深入民间挖掘移民的各种资料则无异于‘深山采芝’。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革命的洗劫之后，家谱、碑文等资料大多荡然无存，少数幸存者也是藏匿至深，难以面世。因而，为了搜集一部家谱、一块碑文，常常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有时要往返奔波多次。如汉阴县南山吴氏，是湖南长沙一支庞大的移民家族，其家谱22卷深藏于凤凰山南麓的一户山民家中，就连吴氏族人中的很多知识分子也难以一睹其貌。我因扶贫工作在这里蹲点三个多月，为这里的一户吴氏族人查明了一起上访五年之久的民事案件，终取得其信任。当一叠半公尺高的

《渤海堂星沙善邑吴氏族谱》呈现在眼前时，鼠咬虫蛀的情景令人扼腕叹息不已。幸亏发现及时，否则，再有两三年的‘珍藏’，很可能只是一堆霉烂的纸屑了！居住在白河县卡子乡的黄庭坚后裔，是江西举族迁陕的移民，为了搞清其来龙去脉，我先后三去白河县实地考察，终于在猴子河口的黄氏旧祠土坯墙中发现并拍照了《黄氏祠堂碑》两方，取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老实说吧，听完这一段叙述，我不禁为之心颤，继之以深思。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尽管有权者在禁、在毁，而为什么老百姓却视之如宝？是前者聪明智慧而后者愚昧之故？个中奥秘值得深思，异日再论不迟。为什么我们的专业史学家迄今不那么重视、或者甚至不屑一顾的族谱，而一位业余史学家却在不遗余力地孜孜不倦地发掘，并且比之为“深山采芝”？个中道理也颇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这里也存着不论。不过，在这里我要告诉读者诸君，良学已经采访到的当地族谱已达 60 多种、碑刻 700 余通之多。就陕南这一方土地而言，国内外掌握存世族谱和碑刻之多现在恐怕还无人出其右者，是谓可喜可贺；但是，从他所述的“当一叠半公尺高的《渤海堂星沙善邑吴氏族谱》呈现在眼前时，鼠咬虫蛀的情景令人扼腕叹息不已。幸亏发现及时，否则，再有两三年的‘珍藏’，很可能只是一堆霉烂的纸屑”的情况中，是不是可以发现抢救这些宝贵财富目前确实实已经达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否则，我们将愧对子孙，其中作为史学家的我们也难辞其咎。因为我们将无法回答我们的下一代：你们当时究竟持什么态度？又做过些什么？正因为像良学这样重视族谱和民间碑石的人实在还太少，他的工作也给了他应得的报偿。《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除了一般的史籍之外，同时还有这些为主要材料研讨陕南的历史发

展问题，自然会使这部书稿别具特色。简而言之，在当今的史界，这样的工作非有卓见者莫为，非具独特的毅力者难成。这就是我之所以钦佩良学之处。试看 35 万言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吧，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前两篇 15 章就不乏可读的内容，不过，史学界有关的论文应该说已有多篇。至于下篇《南北文化的历史沉淀》共 5 章，分别论述了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南北交融的民俗风情，兼收并蓄的生活习惯，色彩斑斓的民间文艺，神秘奇特的宗教文化。本篇各章涉及到移民家族的郡望堂号、谱牒家乘、宗祠族规、岁时节令、礼仪风尚、语言体系、衣食住行、地方戏剧、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祭祀活动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对扑朔迷离的陕南文化民俗的形成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虽说只是初步的了解，但即就与其它地方相比，目前恐怕这种水平的史著也不是很多。至于说到陕南，以我有限的见闻，这部著述应该说是迄今仅见的。

我想，假如我只谈《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的长处而不及其不足，即使没有溢美之过，至少也有缺少诚意之嫌。从事任何专业的人，在他完成了一件作品时，往往会发现遗憾。我粗粗翻阅了该书稿之后，觉得它的最大不足在于书稿并没有发挥出他不知花费了多大心血才收集到的大量族谱和碑刻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中国曾经有世界无比的悠久又系统的史学传统和史籍。举其大者，在全国曾经有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所谓正史，在各地有地方志，在聚族而居的乡村有族谱。历代以来至今天，对正史和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都极其重视，唯独对族谱，或者如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乾隆皇帝，称之为“民间无用之族谱”，命令在编辑《四库全书》时“无庸采取”；或者如建国以来不少地方的干部，在极左路线下以封建主义为由，直接下令并采

取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销毁了难计其数的族谱。甚而至于在史学界的不少人中，迄今仍然以族谱中存在若干失实之辞为由，无视其价值。其实，要是就失实而言，官修史籍中用挖、改、抽、毁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篡改并伪造诸如弑父杀子之类丧尽天良的事实也非某个皇朝的罕见之事。何以学者们不以失实而非薄之？若说封建主义，记载皇朝和地方衙门为主的正史和地方志当是最大或更大的封建主义，何以唯族谱迭遭灭顶之厄运，而前者却整理、注解和研究之不迭，近年还有新编地方志这样的盛世之举？我的意思当然绝不是说我们重视研究正史和地方志的工作不应当，或者说过火了。不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和方面；但相比而言，我们对族谱的态度迄今仍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误解，以致在历史文献方面已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其结果之一是，在史学的发展方面也给自身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严重的阻滞着它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关于族谱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近年来的一系列论著中已经作过初步的阐述，最近还拟作进一步发挥。兹不赘言。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执现今世界古坛牛耳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布洛赫的二点有关看法，或许不是多余的吧。他在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把形形色色的史料区分为二个类型：第一类是希罗多德的《历史》、霞飞元帅的回忆录等等，第二类如古埃及墓中的铭文、中世纪的档案和大量的圣徒行传等等，并在比较了它们的优缺点之后精辟地指出：

“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

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

我想特别请读者注意这段分析，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分量很重，十分精彩，显然针对着年鉴学派的行辈——兰克等实证史学的大师而言，似乎很尖锐，其实是很中肯的。兰克等等史学大师正是反对了传统史学，才使西方史学步入了现代史学的阶段；同理，如果没有本世纪中叶以布洛赫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对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的批判，就不可能使西方现代史学更上一层楼。很可惜，尽管布洛赫的这些话早在1944年反法西斯的战壕中已经写出，并且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要说的话说完就被德寇杀害，而对于像我样只能阅读译本的中国史家来说，竟直到前不久才阅读到他半个世纪前就说过的话。即使如此，假如我们在50多年后的今天能真正理解他的上述见解，犹为未晚。显然，它将会有助于我们对族谱价值的重新评估，从而为开发这个从未被开发过的史学宝藏，为中国史学脱出实证阶段带来新的活力。

读者或曰：不能否认族谱中富集中国乡村社会及其主人——农民的资料，为正史和地方志所远远不及，然其奈谱中多攀附名人与虚应场面之文字何！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色在于家族，而西方传统社会的特色于宗教。因此，假如中国的民间史籍多族谱，那么西方则多圣徒行传。请再听一听《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对此事的见解：

“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圣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的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

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必然从属于过去，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布洛赫的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二句又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好啊！族谱不能等同于圣徒行传，其真实性绝对大大超过后者，但要是我们也能象布洛赫看待圣徒行传那样看待族谱，即使族谱中的攀附名人与虚应场面之文字是不是也含着许多“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而这些被当时人“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材料，是否也可算“其价值就无与伦比”呢？坦言直说吧，我们的史学既严重地受制于自己的传统史学，从近代以来又长期未能摆脱实证史学的阴影，从而使我们的史学未能达到对历史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的程度，就是说，我们未能成功地实现本来可以获得的“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读者可以发现，我是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高度来批评良学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这部书稿的。假如良学在写作本书时就已经能够从这种角度来使用他占用的那样丰富的族谱和碑刻资料，他在理解陕南历史方面的创获会有多大！说到这里，我觉得必须说明，上述意见决无苛求良学之心，却显然包含着一片希望之情。以这位热爱乡土、热爱农民的业余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执著问学而不达目的决不松手的精神，我对他一旦在吸收了当今史学的最新成果之后定当能够发掘和研讨更多的新资料，产生更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从而成为一个陕南历史的大胆探索者抱有充分信心。但